

朱永新 著



困境 与 超越

——当代中国教育述评

G 622.4
H75

应用现代教育技术研究

——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第三小学的探索

黄华明 等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1 中国教育：成就、失误及超越

40年来，中国教育取得了令人可喜成就；

40年中，中国教育也出现了一些重大失误。

作为一个教育理论工作者，我深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底蕴，但也知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道理。我既不愿做报道险情的“乌鸦”，也不想做播送喜讯的“喜鹊”。在这本小书中，我力图客观地把自己对于中国教育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奉献给大家，希冀不仅能唤醒人们的教育危机感与忧患意识，而且能形成人们的教育自信心和希望意识。

1.1 中国教育的巨大成就

40年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和国务院为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解决了教育发展和实际工作上的若干重大问题，使教育事业有了迅速发展。40年来，中国教育的巨大成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我们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及其子女有了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在旧中国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根本谈不上教育平等的原则。而这个原则在新中国却真正得到了体现。在党和政府的领导

下，我们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基础教育体系，相当一部分大中城市普及了义务教育，60%以上的县普及了初等教育。我国人口文盲率已从解放前的80%降低到1988年的20.6%，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从解放前的25%左右上升为97.2%。

——新中国的教育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才。解放以来，大批受到不同程度教育的毕业生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工人、农民和干部队伍中去，逐年改变着社会劳动者技术水平落后，文化素质低下的状况，新中国培养的2200多万专业人才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已经和正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其中，毕业研究生15.4万人，普通高等学校专本科毕业生619.2万人，成人高校专本科毕业生401.3万人，普通中专毕业生969.8万人，成人中专毕业生200多万人。40年培养的高等学校毕业生相当于解放前36年（1912—1949）毕业生的49.1倍。①

——教师队伍不断壮大、素质逐步提高。新中国成立时，我国仅有205所高校，专任教师16,059人，其中教授4786人，副教授2168人，讲师3742人，助教5364人。目前，我国普通高校已有专任教师39.32万人，其中教授1.48万人，副教授7.88万人，加上非教学人员中有教师职务的人数，则高校教师总数为43.71万人，其中教授、副教授10.53万人，占教师总数的24.1%。高校现有教师总数是解放前最高年份1947年的23倍，教授为2倍，副教授为31倍。中小学教师队伍也不断发展壮大，1988年普通中学专任教师达295.9万人，比1949年的6.6万人增加了43.8倍；小学专任教师550.1万人，比1949年的83.6万人增加了5.6倍。通过对中小学教师队伍的不断补充、调整、培训，教师的思想政治和

①参见《喜看新中国教育40年》，朱育理，《中国教育报》1989年9月23日。

业务水平不断提高。1953年小学教师中,具有中师、高中毕业以上学历的只占13.5%,到1988年已提高到68.1%。1988年,初中教师中具有大学专科毕业以上学历的教师占35.6%。高中教师中具有大学本科毕业以上学历的占41.3%。目前,一支在比较清苦的条件下,仍具有高度事业心和责任感的教师队伍(包括教育行政和教育科研队伍)已经建立,并逐步稳定。

——教育的布局、结构按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日趋合理。中等教育的单一化结构有了很大改变。解放初期,全国技工学校只有3所,学生2700人;中等技术学校561所,在校生7.7万人。到1988年底,技工学校已发展到3996所,在校生116万人;中等技术学校有2957所,在校学生达136.8万人。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新创建了9000所职业中学,在校生已达280万人。到1988年,全国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达到555.3万人,占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比例由1978年的7.6%提高到42.7%,使“文革”中盲目膨胀起来的普通高中人数得到了有效的压缩。

高等教育的层次、种类、布局等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研究生、本科、专科在校生的比例由1949年的0.7:100:24改善为1988年的9:100:55,除专科比例仍然偏小外,基本趋于合理。自1988年起,逐渐增加了政法、财经等科类比例和工科中的建筑、食品、医科中的法医、护理等短缺薄弱学科比重。例如,1988年普通高校财经类招生比例由1978年的2.99%增加到11.4%,政法类由0.25%增加到2.12%。一大批新兴学科和社会急需的新的专业,例如电子、计算机、能源、环境、材料、生物技术和医疗技术等也相继建立并发展壮大。目前,文、理、工、农、医、财、法、师等主要科类的

结构趋于齐全和协调，基本上形成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

——多形式、多规格、多渠道的成人教育迅速发展。新中国的成人教育事业取得了很大成绩^①，目前，我国共有成人高等学校（包括广播电视大学、职工高等学校、农民高等学校、管理干部学院、教育学院、独立设置的函授学院等）1373所，同时还有700多所普通高等学校发挥优势举办了函授、夜大学、教师本科班和干部专修科；卫星电视教育现设有地面接收站900多个，收转台370多个，放像点10000多个。成人中等学校共有57287所，成人初等学校18万多所，成人中、初等教育包括各类成人中专学校、普通中专学校举办的职工、干部中专班，成人中学，成人技术培训学校，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扫盲学校（班）等。另外，我国独创的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实施以来，有800多万人应考。开考文、理、工、农、医、财经、政法、教育、体育等科类的76个专业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已在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

建国以来，成人教育共扫除文盲1.63亿人，有半数以上的县基本扫除了文盲。据1988年对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统计，参加50学时以上学习的职工达2954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9%，参加学习的职工有30%接受的是岗位培训。1980—1988年，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共毕业本、专科生275.77万人，相当于同期高校全日制毕业生总数的87.3%。成人中、初等学校的毕业生已超过一亿人。成人教育培养的人才充实了干部队伍和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缓解了社会各界对人才的急需，特别是在中、小型企业以及不易分到并留住全日制大、中专毕业生的地方，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受到了社会的欢迎

^①参见国家教委成人教育司司长董明传的专题报告。

与好评。

目前，中国教育事业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社会各界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也有很大提高。按照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我们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体制，正在进行广泛而深刻的改革。

总而言之，新中国成立40年来，我们的教育事业有了空前的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说“中国40年来的教育彻底失败”、“新中国的教育从理论到实践都不足取”，是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不仅是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也是对千百万教育工作者40年辛勤劳动和创造成果的否定。

1.2 失误：征兆与后果

当然，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对于我国教育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某些严重的失误，也不应回避，不能忽视。我们一方面要对40年来教育的巨大成就有足够的估计。另一方面应清醒地认识到存在的问题与教训。只有在对失误有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纠正失误，防止重蹈覆辙，并使中国教育事业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

具体来说，我们的失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教育思想左右摇摆，经常导致教育功能的狭隘化。教育的三种功能经常处于矛盾甚至对立的状况，如有时强调教育的政治功能，就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来统帅学校教育，重点是培养“红色接班人”；有时强调教育的经济功能，就忽视了教育为政治、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重点只是培养“劳动者”、建设者和各类人才，近十

年来表现尤为明显。有时强调教育的社会功能，认为教育就是要培养具有某种素质的公民。教育思想的左右摇摆，也使教育实践经常出现抓一阵、丢一阵的大起大落状况。

——教育经费严重短缺。我国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1985—1987年分别为2.90%、3.03%和2.75%，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教育经费只有8美元左右，约为美国的1%。近些年教育经费虽增长了2.6倍，但扣除物价因素后却不断下降。1987年比1980年，中小学公用费分别从33.1%和22.1%下降为27.8和16.7%；许多学校的中学生每年每个学生平均仅5元，小学仅1元。许多乡村小学连粉笔、纸张、扫帚都买不起。一些高校也因经费不足，只得砍掉许多应做的教学实验。

——文盲激增，流失生现象不可遏制。1988年国家教委公布的文盲人数为2.2亿，占世界文盲总数的1/4，远远超过整个非洲的文盲总人数发达国家每4人中有1个大学生，我们却每4人中有1个文盲！更为可怕的是，我们的文盲“后备军”队伍庞大，每年以200万的速度递增。在“新的读书无用论”冲击下，流失现象愈加严重，据统计，全国先后有大约3000万左右的中小学生流失，其中不少人成为童工、童农、童商。1987年硕士研究生也有700余人退学。

——教师待遇低下，队伍后继乏人。调查表明，我国教师月工资平均水平排列在国民经济12个行业职工工资的倒数第三，远低于全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在国际水平上比较，我国教师工资收入指数只是同档次发展中国家的1/4，不到印度的1/2。教师不得不在学校摆摊烤山芋、卖商品。我亲眼目睹了许多教师在课间给学生兜售油条、蛋糕的场面，

令人潸然泪下。由于生活清苦和工作超负荷，教师队伍早衰、早病、早夭现象日趋严重，许多教师瞻念前途，不得不“外流”出去，仅北京市从1979到1984就外流了1100余人的中小学骨干教师。在上海市一所有影响的重点中学里，近3年分配的10名应届毕业生，已有9人办理了出国手续。近些年报考师范院校的人越来越少，素质越来越差，教师队伍后继乏人的现象，又给未来教育埋下了深刻的危机。

——办学条件差，教学设施简陋。据统计，全国中小学尚有危房4500万平方米，缺校舍7500万平方米，大批学生只能在祠堂、庙宇、破房中求学，塌房伤人的恶性事故屡有发生。全国中小学的课桌椅还缺1300多万套，许多学生在泥石凳上写字，席地而坐听课。必要的教学实验仪器，在90%以上的中小学都没有配备。在全国的许多乡村，富丽堂皇的办公大楼和气势恢宏的乡办厂建筑，与摇摇欲坠的危房校舍形成了反差极大的对照。

50年代初，马寅初老先生提出了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设想，在“人定胜天”、“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的片面思想支配下，马老的提议只能被当作马尔萨斯的“反动人口论”大加鞭挞，共和国一下子增添了数以亿计的小公民。我们早已在吞噬着人口问题的苦果了，不要说粮食、能源、交通问题了，就是在教育方面，我们也将捉襟见肘。以上海市为例：从1987年开始，市区小学在校人数就在跳跃式地骤增，平均每年净增5万人。到1990年，市区小学在校生将达56.58万人，比1986年净增51.6%，到1993年，市区小学在校生将达66.8万人，净增班级将达4540个左右。如果以一个小学24个班级的规模计算，至少要增加189所学校。由此而来的初中入学高峰，从1993年到1996年，上海市区将达33.4万人，比1986年净增一倍以上。届时，将一

切可以采取的应急措施全部考虑在内，市区中小学至少要新增7000~10000名新师资。①这个可怕的“世纪末入学高峰”将给我们的教育增添多么巨大的压力？！

人口问题已成为教育的“前车之鉴”。然而，教育问题的后患还不象人口问题那样有较长的滞后性，它的惩罚效应已初见端倪，它的破坏作用正在以空前的速度向社会各层面辐射。我们惊颤地看到：报复在即，惩罚已经开始！

——专业人才匮乏，劳动力素质较差。据1980年统计，在我国的10亿人口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0.6%，不仅低于许多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如巴西是1%，南斯拉夫是2.3%，苏联是4.5%，日本是6.4%，加拿大是12%，美国是14.9%。这八、九年来，我们与别国的差距更加拉大了。另据资料统计表明，我国的大中小企业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5%，80%以上的职工只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在农村，平均一万人中才有一名中专生，3万人中才有一名大学生。在全国星罗棋布的乡镇企业中，平均每个企业只有专业人才0.4人。②

中国的各类高级人才奇缺严重。据有关人才机构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预测，到本世纪末至少需要补充高级人才数十万人。按目前的教育现状，再过50年也弥补不了这个缺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驻曼谷办事处官员朱小奇先生曾统计过亚太地区80年代中期每10万人口中的大学生数，结果如下：阿富汗120人，澳大利亚2464人，孟加拉国462人，缅甸489人，中国168人，印度600人，日本2006人，南朝鲜3672人，马来西亚599人，蒙古2297人，尼泊尔379人，新西

①《危机在悄悄地行动——来自中小学第一线的报告》，杨国顺、沈勉荣，《上海教育》1989年第1、2期。

②《来自神圣学府的呼声》，潘益大，《文汇报》1989年3月4日。

兰3225人，巴基斯坦488人，菲律宾3621人，新加坡1406人，斯里兰卡432人，泰国1998人，苏联1847人，香港1410人，土耳其863人，伊朗439人，斐济272人，越南212人，巴布亚新几内亚144人，老挝122人。①专业人才的奇缺，给劳动效率的提高造成了极大困难，“一流的设备、二流的技术、三流的管理”成为普遍现象，在一些大型企业，竟然经常出现花外汇几百万美元购置的设备“睡觉”、“瘫痪”的现象。

有人打了一个这样的比喻：要想结出丰硕的经济建设之果，就必须绽放出绚丽多彩的科技之花；而要想绽放出绚丽多彩的科技之花，就必须具有肥沃的教育土壤。如果不注意培养科技人才，不注意劳动者素质的培养与提高，即使有再先进的设备，再优越的条件，也不可能开出绚丽多彩的科技之花，结出丰硕的经济建设之果。

——教育质量下降，在校生问题叠出。教师队伍的流失使在职教师士气低落、军心不稳。校长们整天想的是到哪里去挣钱，望赵公元帅多多保佑。于是校园有限的空间被不断地“切割”，校舍本来就很紧张却不得不出租，为的是给教师多发几元奖金。上海一所颇有名气的中学，地处闹市，为了百万元的厚利而推倒了近200米长的围墙，忍痛牺牲了一个象样的球场，先后开出了60间店面，出租给经商单位；某中学的校门口挂起了“经营部”、“信息部”、“修理部”多块牌子，琳琅满目，学校的校牌则相形见绌，反显得不协调了。教师们在生活、经济等压力和重负下，也难以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工作。有人曾对高级知识分子的低值劳动耗时进行了调查，发现“高级知识分子一周内用于家务劳动的平均耗

①《亚太地区教育的未来》，朱小奇，《教育参考资料》1988年12月第29期。

时为13小时，……处理完全可以由单位内其他人承担的工作平均为5小时，其他如办事手续繁琐、重复劳动等所造成的低值劳动平均为6小时，低值劳动所耗费的时间约为52%。”对于中小学教师来说，这种非专业性的、低值劳动当然占时更多了！①在农村，许多民办教师还要回家种责任田、当保姆，哪有时间来研究和提高教学质量呢？内容的枯燥、方法的陈旧，加之社会分配不公——“知识越多越贫穷”的消极影响，使学生们日益对读书不感兴趣，产生了厌学情绪。

由于德育工作的松懈，社会上“文盲+法盲”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严重危及到民族基础文明素质的提高。据调查，上海市近年来恶性犯罪案件成倍增长，其中青少年在校学生犯罪案件直线上升。山西省有一个市，仅1987年元月至1988年4月，就查获违法犯罪的在校中小學生227人，占全市违法犯罪人数的10.5%以上。1987年全国青少年犯罪占犯罪案件总数的74.3%，犯罪学生的年龄之小、手段之狡猾、技术之高超，令人瞠目结舌。

——社会风气不正，腐败现象抬头。教育质量的下降使人的素质也随之降落，从而给社会风气造成了负面影响。在工厂，一些工人劳动纪律松懈，干活懒散；在农村，部分农民没有心思也不愿意花大力气种好粮食；在机关，少数干部以权谋私，官僚主义盛行。苏州大学学生在交流1989年寒假见闻时，反映了大量令人愤恨的事实：有的学生说，春节前中央发了通知不准“公费过年”，但今年的公费过年却胜过以往任何一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的话没人听。有的学生说，现在群众中流传着一首顺口溜：发票开来开去，商品倒来倒去，礼物送来送去，领导吃来吃去。有些学生反

①引自《值得每个中国人担忧的教育危机》，鲁洁，《教育研究与实验》，1988年第2期。

映，赌博社会化、迷信公开化，是当今社会的一大特点。春节期间，上至八十岁的老人，下到十几岁的少年，老老少少齐上阵，赌注少则几十，多至成千上万。有的人家成了赌博专业户，有的厂长室是以洽谈业务为名的赌场，有的派出所就是赌场。迷信活动日益猖獗，一些神汉巫婆公开挂牌骗钱发财。泗阳县的学生反映，现在农村中打群架出现了公开比武，旧社会的帮会如青龙帮、降龙帮又重新恢复活动，帮会成员都在手臂上刺了字。有些学生反映，有的地方农民偷盗火车上的物资成群结队，扒起车来好象当年的铁道游击队。射阳县还出现了海盗。部分学生在各地人才市场上获悉，大学生滞销，研究生不要，人才市场上关系交流已代替了人才交流，“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又在学生中流行起来。

社会不正之风已引起有识之士的忧虑。原北京市三十一中校长孙焕然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民族素质下降的根本点不在于文化素质的下降，也不在于身体素质的下降，主要是道德素质和思想素质下降了，为民族的素质感和为国家的义务感大大降低了。一些海外华人都大声疾呼，我们还不如国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表现。作为已有近四十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中国，这是很值得深思的问题。”①是的，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度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在一个国民素质落后的国家也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

而且，就在我们教育大滑坡的同时，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加快了步伐，对教育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投资，我们在逐步拉大与其他国家的教育差距，这实际就是在拉大国民素质的差距，拉大经济实力的差距。如果我们再不反省、再不重视，一百多年前的悲剧就可能重演。如果说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还可以把责任推给毒蛇的“诱惑”，那么，若干

①《教育是立国之本》，孙焕然，《科技导报》1988年第5期。

年后我们被开除“球籍”，能寻出什么托辞呢？！

1.3 超越教育困境

几十年前，面对异族入侵，我们唱起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悲壮之歌，迎来了共和国的诞生。现在，虽然它已成为国歌歌词的内容，但这种深重的危机感对我们来说陌生起来了。高枕无忧、夜郎自大的心理几乎麻木了我们的神经，倒是那些发达国家却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奏起了危机悲歌。

1983年4月，美国高质量教育委员会经过18个月的调查，发表了题为《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给美国人民的公开信，信中写道：“我们的国家处于险境。我国一度在商业、工业、科学和技术上的创造发明无异议地处于领先地位，现在正在被世界各国的竞争者赶上。……我们向美国人民报告，当我们完全有理由为我们的大中小学在过去历史上取得的成就和为美国及其人民的福利作出的贡献而感到骄傲的同时，我国社会的教育基础目前受到日益增长的庸庸碌碌的潮流的腐蚀，它威胁着整个国家和人民的未来。”^①这封公开信引起了美国朝野的普通关注，当年年底，里根政府就召集了“全国教育质量讨论会”，与会者达2300多人。接着，联邦教育部和卡内基基金会通过长达数年的全国规模的调查，分别于1984年和1986年公布了提高美国高等教育质量的研究报告。

几乎与此同时，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一系列的方针决议：《苏联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改革的基本方针》（1984年

^①《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和趋势》，教育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4月)、《关于进一步完善青年的中等普通教育和改善普通教育学校的工作条件的决议》(1984年4月)、《关于进一步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和提高它在培养熟练工人方面的作用的决议》(1984年5月)、《关于进一步改进公共学前教育和培养儿童作好入学准备的决议》(1984年5月)、《关于提高教师和其他国民教育工作人员工资的决议》(1984年5月)。1988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又提出了新的教育改革的设想。

日本为了解决“教育荒废”的问题,于1984年3月成立了首相府的教育咨询机构——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经过3年的时间,召开了90次全体会议,670次分组会议,分别于1985年9月、1986年4月、1987年4月提出了三次教育改革的咨询报告。1987年8月,文部省又成立了“日本教育改革实施总部”,继续推进改革。

其他许多国家,如英国、法国、西德、瑞典等也都在八十年代初提出了教育改革的报告。1987年7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第6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会议的主题仍是:“教育:危机与变革”。

“危机”这个词,长期以来已成为资本主义的“专利”,用它来形容我们的事物,总有给社会主义抹黑之嫌。其实,只要回顾一下历史就可发现,危机在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是什么新鲜事。1921年春,列宁就承认苏维埃政权“遭到严重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1923年又有“销售危机”,1928年还有“粮食危机”。这些危机不仅没有把社会主义淹没,相反,正是这种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使社会主义战胜了危机。这正应验了中国的一句古训:常思危困必无危。

如果我们瞩目世界,就会发现,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不仅是一些先进国家中公民意识的重要构成,也是政府首脑的一致共识。1987年世界股市动荡,随后日元大幅度升值,这对

日本无疑是非常有利的情势，但日本政府却居安思危，对此事大加渲染，迅速动员国民讨论对策，一时间，仿佛日本大难将至。日本的中小学教科书上写着这样的内容：“日本国土狭小，没有资源，只有靠技术、靠奋斗，否则就要亡国。”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从小就被输入了未来的公民的大脑中，督促着日本民族为争取生存而不断进取。可以说，正是危机和忧患拯救了日本。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我们的小公民从小就在“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矿藏丰富”的自豪感中陶醉，甚或麻木……

1979年，一位美国学者写了一本《日本名列第一》的著作，没料到立刻成为畅销书，在欧洲被竞相翻译出版，在新加坡则被定为政府官员的必读书。美国前总统里根1988年4月2日发表讲话，认为美国若不再加强科学技术的研究，增加科研经费的开支，就很可能在科技上沦为二流国家。美国政府不断告诫美国人民：“21世纪将是亚洲人的天下”、“日本第一”、“欧洲正在崛起”等。但是，日本人却格外地清醒，仍然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美国人为什么故意不评论我们的弊病？不，这是美国人想麻痹我们的斗志，这是一个阴谋！”^①不妨想一下，如果有朝一日外国人也写一本《中国名列第一》的著作，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如此看来，要真正地解决教育危机，超越中国教育的困境，当务之急也许莫过于进行危机教育，强化每一个中国人的教育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了。

教育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包括普遍性和深刻性两个方面。^②所谓普遍性，是从社会角度而言的，指教育危机感和忧患意识的普及程度，即全社会有多少人意识到教育危机的

^① 《从“教育危机说”引起的思考》，金世柏，《天津社联学刊》1988年第2期。

^② 参见《教育危机与危机意识》，杨识愚，《教育研究与实验》1988年第4期。

存在，对教育事业的未来发展忧心忡忡。就这一点看，我国的普遍性程度是很低的。近几年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沸沸扬扬，有识之士痛切直言“不重视教育将成为千古罪人”，报纸刊物不断呼吁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师待遇，可谓“气氛热烈”。然而静心一看，呼吁关心教育的大多为教育界人士，工、商、农、军人士寥寥无几；要求重视教育的以知识界为众，其他人士凤毛麟角。在全国人大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收到的2188种议案，3000多种建议与意见中，属于政法、财政方面的约占40%，而“科、教、文、卫”加起来只占总数的25%左右。

教育危机感和忧患意识的普遍性差，使得教育界为教育的生存和发展孤军奋战，社会上阻力重重，政策和义务落不到实处。事实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都是得到了每个公民的理解与支持的，在许多国家的教育改革文件中，都要求“人民能获悉真相”。在美国1984年《国家处在危险之中》的报告中，就引用了托马斯·杰斐逊的名言：“除了人民自己，我不知道谁是社会最终权力的可靠保管人。如我们认为，人民在管理社会作出审慎的判断时，还嫌他们不够有教养的话，补救的办法不是剥夺他们手中的管理社会之权，而是告诉他们如何去判断。”在日本1985年《关于教育改革的第一次审议报告》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认为，此次教育改革的成败，首先取决于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同时，也取决于每一位教师、家长，包括在所有教育机构中工作的人员和学生以及全体国民的教改意志，取决于他们对子孙后代的爱护心和责任心。为使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教育改革获得成功，恳请全体国民能够理解和协助我们。”^①在苏联，

①《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和趋势》，教育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57页。